

民意與天意

——辛亥革命的民眾回應散論

• 張 鳴

無論從那個角度說，辛亥革命都是一個分界線：作為正統史學界的公議，辛亥革命劃開了帝制和共和兩個時代；而在有些人的眼裏，它卻標誌着無序和動盪的開始。中國近代史上這非同小可的一筆，雖然在當時看來似乎純粹是由革命黨的精英塗抹出來的，但於被視為「後知後覺者」的普通百姓其實同樣有着很大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講，老百姓的態度事實上影響了這場革命的形勢，甚至決定了它為甚麼日後會有那麼多不盡人意之處。也可以說，這場某種意義上算是精英革命的革命，其意義越是深遠重大，就越是有必要討論一下當時民眾對它的反應。

一 「氣數說」與變革的悖論

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告訴我們，辛亥革命得到了勞動群眾普遍而熱烈的擁護。除了一點必要的誇張之外，應該說這種說法並無大錯，儘管我們可以在當時的史料中找到熱烈擁護的場面，也可以發現冷漠旁觀的人群，但下層老百姓對革命表示強烈反感確實也非常少見。應該說，這對於一場以西化為目標的變革來說，的確是非常不容易，就在這場革命爆發前十幾年，康梁變法失敗的時候，老百姓還普遍地將這些改革志士視為漢奸。到目前為止，我翻遍了所能找到的史料，也僅有一條說在江蘇靖江的小縣城裏，一位賣五香豆的老太婆，對這場革命發出了一聲「皇帝江山從此送掉」的歎息，還因此被警察拘押了半响^①。雖然沿海和城市的平民百姓對革命反應熱烈，內陸和農村要相對漠然一點，但很少有人對那個統治了中國260年之久的王朝的垮台表示惋惜。

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統治威信大幅墜落的十年，對於那些對政治並不敏感，甚至對革命黨人賣力地宣傳不甚了了的下層百姓來說，如果說他

辛亥革命得到了勞動群眾普遍而熱烈的擁護。這種說法並無大錯，儘管在史料中還是可以找到冷漠旁觀的人群，但下層百姓對革命強烈反感的確非常少見。我翻遍了所能找到的史料，也僅有一條說在江蘇靖江的小縣城裏，一位賣五香豆的老太婆，對這場革命發出了一聲「皇帝江山從此送掉」的歎息，還因此被警察拘押了半响。

「氣數說」是中國固有的帶着神秘色彩的政治理念，氣數已盡的民間說法，往往意味着民不聊生和民怨沸騰。比較耐人尋味的是，民眾對於清朝政府的怨恨，很大部分是源於新政的實施。當時幾乎所有的新政名目，從辦學堂、辦警務到興辦地方自治、清查戶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斂財的機會，各種田賦附加和捐稅，均被冠以新政的名義。

們也有一些改朝換代的預感的話，那麼恐怕更多的來源於歷史習慣。在多少懂得一點歷史知識的老百姓眼裏，一個統治了260年的王朝，無論如何也是該壽終正寢了。一時間，有關清朝氣數已盡的民謠，盛傳於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隱晦一點的有：「爺爺落，鬼出窩，趕上小兒跑不脫。」《成安縣誌》為此加注說，此歌謠意為「朝廷微弱，列強肆橫，清代不久將喪失主權，清祀一二傳亦將斬也」^②。比較明白的則有：「遼陽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誰是誰，一省各有主。」^③「不用掐、不用算，宣統不過二年半，今年豬吃羊，明年種地不納糧。」^④「頭戴小饅盤，身穿一裹園，宣統作了帝，不過二三年。」^⑤辛亥革命前夕，在西安的大街上，引車賣漿者流居然敢公開說：「大清家快完了！」因為「明朝不過二百幾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還不亡麼？」^⑥這些民謠和傳言，有些固然有革命黨人的因素，但能夠迅速地流傳開來，畢竟說明它們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種心理。反過來說，革命黨人其實也受到了「氣數說」的影響，我們在許多起義後建立的軍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到諸如「上徵天意，下見人心」以及「胡運告終」之類的說法^⑦。

「氣數說」是一種中國固有的帶有神秘色彩的政治理念，蘊涵了五德循環的古老觀念，而且為王朝興衰的周期律所證實，受歷史感頗強的民間戲曲小說的熏染以及《推背圖》、《燒餅歌》之類的讖書的影響，民間自然不難接受這種觀念，但是這種說法成為針對「本朝」的普遍流行意識，畢竟要有嚴重的政治腐敗，普遍的社會動盪的背景襯托。氣數已盡的民間說法，往往意味着民不聊生和民怨沸騰，統治者不僅失政而且失德。在南通，由於清政府苛捐雜稅繁重，經辦官吏又層層勒索，「工商業者怨恨極了，大罵亡國政府，且有附會《推背圖》、《黃蘗詩》各種讖言，以決定清朝必然覆滅」^⑧。自然，一個氣數已盡的王朝，在百姓眼裏繼續維持下去的合法性依據也就沒有多少了。比較耐人尋味的是，民眾對於清朝政府的怨恨，有很大一部分來源於新政的實施。

自1903-1905年開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後一次，也堪稱是最認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這場改革卻只能依靠行政手段來推行，本來就已經陷入腐敗和失效的行政網絡，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後的瘋狂，「借新政之名，其實金錢主義」^⑨。幾乎所有的新政名目，從辦學堂、辦警務到興辦地方自治、清查戶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們斂財的機會，各種田賦附加和捐稅，均直接被冠以各項新政的名義。地方自治實際上成了行政觸角的延伸，自太平天國以來已經逐步劣化的鄉紳，名正言順地把持了具有政府職能的各級自治機構，成為農民的直接統治者，喪失了原來處於政府與農民之間的調處者身份。先前受人尊重的鄉紳，變成了農民切齒的對頭，各地時常發生自治局的紳董受到農民圍攻甚至被殺的事件。進而，新政以來的民變，有相當大的部分與新政有關，農民由反對攤派和勒捐，到反對新政舉措的本身，各地的徵收機構、警察局甚至新學堂都成了圍攻的對象。辛亥前夕，各地農民和市民打鬧自治局、徵收和清丈機關的事情層出不窮，比較極端的事例像山西的乾草會騷動，不僅主張「進城先抄洋學堂，以後再殺巡警兵」，而且發生了多起殺害學堂教員事件^⑩。

應該說，新政的實施，雖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別，但在大方向上與辛亥革命的目標是一致的，均屬於西式的向着現代化的改革。然而，對於這種改革的怨恨，卻成了同一目標更大變革的動力，這對於清廷和民眾來說，都是難以想像的。庚子以後，巨大的賠款和外債壓力，已使民眾對於經濟負擔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而日益臃腫和失效的官僚體系更是難以承擔改革重負。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將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關頭才進行改革，社會根本無力承受越來越大的改革成本，分崩離析在所難免。而死到臨頭尚不自知的滿清王朝，卻又在最後關頭不自量力地企圖將久已散在地方的權力收回中央，甚至利用假責任內閣一舉改變自太平天國以來滿輕漢重的局面，結果是得罪了所有人，為自己墓穴挖好了最後一畝土。新政或多或少被人們視為清朝政府氣數已盡、倒行逆施的表現，而對新政的仇視，則成為一般民眾樂意看到清朝垮台的心理基礎，其實他們並不知道這場革命的性質到底是甚麼。

二 對革命與革命黨的印象——反清復明與改朝換代

儘管革命黨人做了大量宣傳工作，但是影響基本上僅限於知識階層。下層民眾對於革命的理解，極易誤會為反清復明。同時，革命黨也難以跟會黨劃清界限，我們知道，同盟會最樂於聯繫的下層社會中人就是會黨。「反清復明」雖然只是會黨的一個與自身的現實目標關係模糊的口號，但畢竟他們沒有將它全然忘掉。在清朝呈現出明顯的末世跡象的時候，他們自然樂意重提往昔的宗旨，也好從「第三社會」衝殺出來，重溫稱王稱帝的好夢。革命黨人在與會黨合作的時候，一般都遷就會黨的固有主張，雖然有所修正，但微乎其微，多數革命黨人其實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滿，而對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進行革命鼓動時，居然操着跟會黨差不多的話語。魯迅的好友，屬於光復會的孫德卿，曾經很熱心地拿從畫像上翻拍下來的明朝皇帝的照片分送給農民，並宣傳說：「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組成的，我們應當把他們打出去。」^⑩在革命前夕，凡是感覺到革命暴動跡象的人們，很容易將革命聯想成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殺韃子」，陝西起義前夕，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說，真的「又復充盈街巷」^⑪。不僅如此，在革命中，會黨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天地會、哥老會、清幫、洪門、漢留與袍哥，在各地民軍中佔據了相當的份額，有的地方如西北甚至舉足輕重。在獨立各省，他們自稱「兵馬大元帥，見官大一級」，穿戲衣，蹬皂靴，兩鬢結絨球，招搖過市，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革命後的中國已經是洪家的天下了。所以，老百姓以對會黨的固有印象來看革命黨，將革命視為反清復明的暴動，也的確順理成章。

從另一個方面說，革命黨人在革命中的行為也加強人們的這種印象。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反映辛亥革命時鄉下人傳說革命黨人白盔白甲，為崇禎皇帝戴孝，而革命黨人在各地起義時，大多數都真的張白幟、袖白臂章，甚至有的還繫白腰帶，以至於有些冒充的革命黨，比如一度進據揚州的流民孫天生，

下層民眾極易誤會革命是反清復明。同時，革命黨也難以跟會黨劃清界限，會黨的身影在革命中幾乎無處不在，在各地民軍中佔據相當份額，有的地方如西北甚至舉足輕重。在獨立各省，他們自稱「兵馬大元帥，見官大一級」，穿戲衣，蹬皂靴，兩鬢結絨球，招搖過市，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革命後的中國已經是洪家天下了。

則「一身纏白色洋綢(由足脛至頭頂)」，白了個徹頭徹尾^⑨。不管革命黨人「尚白」的真實意圖是甚麼，但老百姓和孫天生之輩，確實將之理解為反清復明的一種表示，革命黨的行為實際上印證了老百姓的想法。

但是，反清復明的口號與逝去的明朝一樣，即使對於會黨也過於遙遠了。幫會雖然一直屬於一種令政府頭痛的社會異己力量，但他們並不真的非要貫徹這個宗旨不可，他們長時間不放棄這個口號，更多的是出於某種歷史的慣性，也許革命黨與會黨之間更多的是相互利用，但彼此更在乎的都是排滿。在革命中，幾乎所有投入起義的會黨中人都不再打朱家的名號，過去會黨起事中常見的「朱三太子」之類的名目，此次悄然地銷聲匿迹。所以，對於會黨自己和旁觀的老百姓來說，革命對他們更多的是意味着一次成功的改朝換代，一次漢人取代滿人的朝代更迭。革命黨人在革命中也對這種思想予以支持。各地黨人在起義時，往往更強調「光復漢族」，對「建立民國」則較少提及，在他們高舉的白色旗幟上，往往寫上一個大大的「漢」字，告示上一般都用「黃帝紀元」，所以，一般老百姓很難不將之想像為漢人取代滿人的「鼎革」之舉。經過辛亥革命的一位四川老人回憶說，革命中，一些地方猛然間冒出了不少頭戴方巾，身穿白色圓領，寬袍大袖衣服的人，四川軍政府成立，人們問一個從成都回來的人，軍政府都督蒲殿俊是怎樣穿戴的，那人回答說：「他頭戴紫金冠，插野雞翎子，身穿大紅袍，腰圍玉帶，足穿粉底朝靴」，而聽者卻都信以為真^⑩。顯然，在相當多的老百姓心目中，通過革命上台的新統治者，理所應當就該有這樣一種戲台上的漢官威儀。甚至明明白白的共和制度擺在面前了，下層民眾還是將新的當成舊的來看。據當時在南京的英國領事跟他的公使匯報說，南京的下層人士「通常談到孫文博士是新皇帝，他們不了解總統這個專門名詞，認為它不過是更高頭銜的一個委婉的說法」^⑪。事實上，幾乎所有革命後冒出來的新頭銜，無論是總統還是縣裏的民政長，在老百姓眼裏，與過去的皇帝與縣太爺並沒有甚麼區別。對於有的老百姓來說，甚至革命是甚麼意思都不太清楚。揚州的市民以為「革命黨就是大家合(揚州方言讀「合」如「革」)一條命的黨」^⑫。

雖然老百姓對革命黨該是甚麼樣子，腦袋裏是一盆糲糊，糊裏糊塗，但卻往往將他們傳得神乎其神。揚州市民就傳說革命黨的厲害——「能把炸彈吞入腹中，遇到敵人時，將身一躍，人彈齊炸」^⑬。而革命黨人的兵器更是神得不得了，說是革命黨人有一種「無煙炮」，「只要二指頭挨到機器一搬，對面的人立刻一排一排的倒地而死」^⑭。革命黨的這種神奇，似乎與洋人有點關係，老百姓往往將革命黨人與之聯繫起來，當然，這與革命黨人的領袖多為來自海外的留學生不無關係。由於這層因素，以至於革命期間一有外國軍隊的動靜，民間便傳說是來幫助革命黨人革命的^⑮。這種神化革命黨的傳說，對革命黨無疑是有利的，也是民眾希望革命成功心願的一種曲折的反映。

將革命視為改朝換代，將革命黨視為會黨甚至是戲台上的英雄，屬於民眾心目中舊影像的再現，而傳揚革命黨人洋派和神奇，則又摻入了「新」的感覺，但都是希望革命黨能夠成功。民眾所圖的只是朝代能夠改換，至於新朝是甚麼樣子他們並不太在乎，只要能比舊的強就行。

雖然老百姓對革命黨該是甚麼樣子，腦袋裏是一盆糲糊，糊裏糊塗，但卻往往將他們傳得神乎其神。揚州市民就傳說革命黨「能把炸彈吞入腹中，遇到敵人時，將身一躍，人彈齊炸」。革命黨的這種神奇，似乎與洋人有點關係，老百姓往往將革命黨人與之聯繫起來，當然，這與革命黨領袖多為海外留學生不無關係。

三 新名詞的浸潤與老百姓的期待

雖然對於革命並不真的理解，但是相對於其他幾次現代化的變革，辛亥革命對一般老百姓的震動是比較大的。戊戌維新的時候，絕大多數鄉下人根本不清楚京城裏發生了甚麼事情，而辛亥年間皇帝的江山從此送掉，卻是大部分農民都知道的事。同樣，與前幾次變革不同，老百姓對於辛亥革命也有某種希冀。一位留日的湖北籍學生在北京聽聞武昌起義的消息，決定前去參加，「他看到沿途小販，只顧宣傳革命，不暇照顧買賣。有人問他們為何不注意自己做生意，一致答稱：『只要革命成功，不愁沒有飯吃』」^②。說小販「宣傳革命」多少有點誇張，但是幻想革命成功有飯吃卻是老百姓實實在在的希冀。還在1911年的5月，就連任長沙稅務司洋人司偉克都已經看出，「大多數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③。換個政府會怎麼樣？並沒有太多的人會去想，只知道清朝太糟糕，改換天地之後，無論如何都應該會有所改變。

大多數老百姓對政府的指望，一是維持社會安定，二是減輕一點租稅和負擔。辛亥革命期間，各地農村紛紛出現抗租抗稅的騷動，有的還具有相當的規模，近乎於農民暴動。這些騷動顯然不同於那些乘革命之機起事搶劫發財的暴亂，參加者既不是綠林好漢也非幫會人物和散兵遊勇，他們都是在鄉間種地為生的農民，他們的要求也帶有很強的合理性。對於一個前現代國度，既要發展現代工商業，又要進行現代化的體制改革，同時還要承擔巨額的賠款和外債負擔，幾乎所有的成本都要由農民來支付，在這種情況下的農民實在是不堪重負。改朝換代對農民來說無疑是一種機會，在一些農民看來，「皇帝已經沒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租米不僅指地主的租，還包括官府的捐稅）」^④。當然，他們中的大多數指望着新的政府，尤其是直接管他們的地方政府能有所行動，改善他們的境遇，而其中性急的，就自己幹了起來。特別耐人尋味的是，某些農民抗租騷動，居然打出了他們所不懂的新名詞和新頭銜，用來號召人眾。湖北黃梅縣張天霸組織「政黨」，取名為「農林黨」，並「黏貼告示，開堂散票」，宣稱「農人得入黨籍，將來佃人可以不交納租課」^⑤。江蘇無錫常熟地區農村的「千人會」組織，在辛亥革命期間發起抗租抗稅活動，成立「司令部」，推舉農民孫二孫三為「都督」，樹起的大旗上寫着「千人大會」、「仁義農局」字樣^⑥。而南通絲魚巷農民抗捐起事，首領則是「總司令」、「軍政長」、「財政長」。最出奇的是他們的口號，居然是甚麼「自由擇善」、「自由擇君」^⑦。其餘像打出革命軍、民軍、獨立、共和招牌的還有很多。很明顯，這些起事的農民對於他們拿來的的新名詞和新頭銜並不理解，但卻沒有因此而減少他們拿來的熱情。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在辛亥前是非常少見的，那時的農民和流民的起事，往往還襲用過去的名號，諸如皇帝、王、將軍和軍師等等，應該說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才點燃了農民模仿和拿來的熱情之火。

國門打開70餘年以後，經過長期中西間的碰撞和西學，特別是西方事物的浸潤，以及庚子義和團事件的大刺激，即使是農民，不僅知道洋槍洋炮厲害，甚至也有一部分知道了西方非物質層面的東西也同樣具有威力。辛亥革命那些頂着新頭銜、喊着新名詞的革命黨人推翻清朝政府的活生生的現實，無疑強化

農民大多指望改朝換代後的新政府能改善他們的境遇，耐人尋味的是，某些農民抗租騷動，居然打出他們所不懂的新名詞和新頭銜。例如南通絲魚巷農民抗捐起事，首領是「總司令」、「軍政長」、「財政長」。最出奇的是他們的口號，居然是甚麼「自由擇善」、「自由擇君」。

了這些名詞和頭銜在他們心目中的魅力。那些不倫不類地拿來新名詞、冠以新頭銜的農民們，肯定以為這些東西具有某種說不清的力量。雖然他們弄不清「革命」、「政黨」、「共和」以及「自由」這些名詞的真實含義，但既然強大的洋人喜歡這些東西，而學習這些東西的新派人物居然推翻了皇帝，那麼這些東西肯定是有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期間人們存在着的「制度迷信」，多少已經影響到了下層社會，儘管下層社會的人們可能只是出於某種近乎巫術的心態，經過農民固有的實用理性的中介作用，才會迷信新名詞會給他們帶來好運。

然而，這些看起來似乎有點可笑的現象，實際上卻蘊涵着悲苦的無奈。農民煞費苦心地打出「新」的旗號，其實不過是為了減輕一點租稅。借新名詞為自己的抗租抗稅之舉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用他們以為是革命黨人的「道理」來為自己壯膽。這裏，既有對革命和革命後建立的政府的迎合，更有迫不及待的期待。可是，剛剛嚐到政權滋味的革命黨人，卻只將這些現象當成笑話，將農民的抗租抗稅視為作亂，毫不猶豫地採取了鎮壓手段，他們的行動甚至比那些保留下來的舊政權還要果決。攻克南京之後，江浙革命黨人最忙的事情不是北伐，而是鎮壓抗租抗稅的農民，在革命黨人的都督和軍政長的命令下，剛剛與清軍作完戰的民軍，一次又一次地開進了農村，不分青紅皂白地將農民的都督和軍政長剿滅，非但不准阿Q式的農民革命，連農民合理的要求也置之不理。在革命進行過程中，一位英國外交官通過觀察感覺到，「實際情況是：改變統治者對大多數人是毫無意義的，而從君主制變為共和制，對大多數人來說只不過是改變統治者而已。關於皇帝和議會，除了作為名稱之外，老百姓是一無所知的。他們所熟悉的政府機構中的那部分主要是衙門差役，而已經發生的事情並未包含對該部門進行根本改革的希望」^{②⑧}。一位美國學者的看法似乎更苛刻一點，但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他認為，同盟會在革命後，是「按照傳統的方式，作為軍隊和徵稅者進入農村」，這樣一來，「那些新貴們及其政策，就和他們的軍事和財政基地一樣，很難與既得利益的舊秩序區別開來」^{②⑨}。在農民眼裏，新政權在徵稅催捐方面似乎與清政府並沒有多少分別，縣政府的衙門，除了插了一面白旗而外，一切照舊。滿清還沒推翻，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的談判尚在進行，而各地的民政與軍政長官則均忙於催租、徵稅和「拿辦亂民」，不旋踵則布袍子就換成了皮袍子，可是南京臨時政府卻連一分錢上繳經費也拿不到。時人諷刺道：「新朝氣象百弊無，惟有租賦難蠲除。大府火急籌軍需，嘵嘵抗訴胡為乎？多言爾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攀拘。小民畏法長歎吁，痛深不覺涕淚濡。」^{②⑩}

在革命過程中，一位英國外交官觀察到，「實際情況是：改變統治者對大多數人是毫無意義的，而從君主制變為共和制，對大多數人來說只不過是改變統治者而已。」在農民眼裏，新政權在徵稅催捐方面似乎與清政府並沒有多少分別，縣政府的衙門，除了插了一面白旗而外，一切照舊。時人諷刺道：「新朝氣象百弊無，惟有租賦難蠲除。」

四 留住辮子

當然，我們說革命後的新政府與清朝政府沒有分別也是有點冤枉。新政府至少有一件事是與舊政府根本相異的，那就是為男人剪辮。當年滿清入關，剃髮留辮是作為順從統治的標誌而強行推行的。為了頭上的頭髮和腦後的辮子，漢族老百姓死了不少。然而，兩百多年過去了，漢族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習慣

了腦後的辮子，雖然晚清以來某些知識人在西風熏染之下，受不了洋人譏辮子為pig tail (豬尾巴) 而憤然剪辮，但絕大多數老百姓還是將辮子看得相當重，決不肯輕易地讓它損傷分毫。

然而，革命的到來使辮子的命運再一次發生了重大轉折。在人稱革命政府最忙的三件事，即剪辮、放足和打菩薩中，他們最熱心、執行最力的就是剪去男人的辮子。凡獨立各省，尤其是那些靠革命黨人拼殺而獨立的地方，幾乎一進城就會有剪辮的文告出台，武裝的剪辮隊上街強行為人剪辮。有的地方甚至有好幾撥剪辮隊，有來自民軍的，也有來自警察的和學生的。其中學生和民軍的積極性最高，而警察則視之為例行公事。當然，強行剪辮的「武行」出台之前往往有屬於「文行」的宣傳，在街頭為老百姓宣講剪辮的好處和必要性，但是由於往往文的沒有演完武的就開鑼，所以老百姓只要一聽到有人宣傳剪辮，馬上望風而逃，結果最後只剩下「武行」了——就是突然襲擊，抓住按頭便剪，或者守在城門口，所有進出人等，有辮子的就是一剪。有的地方，革命黨人對於辮子不僅強按頭採取斷然措施，而且通過法律手段硬性推行。比如浙江寧波軍政府就貼出告示，宣稱凡不服從剪辮令的，「剝奪其公權及訴訟權」^⑳。為了抗拒剪辮而吃官司的也不乏其人^㉑。

如果說，老百姓對於革命黨推翻清朝的行動還算擁護的話，那麼對於掌握權力的革命黨人的強行剪辮之舉，他們可是非常的不情願。被抓住剪辮的人，哭鬧喊叫甚至與剪辮隊發生扭打的都有，農民則乾脆不進城了，集市為之一空。某些聰明人為了逃避剪辮，將辮子盤起，再戴上頭巾，以遮人耳目，還有將辮子散開，紮成抓髻裝道士的，道士服裝一時也值錢起來。某些地方甚至開始流行一種尖頂帽，「帽的款式，尖頂聳起，帽的容量，由於高高聳起，足可容辮子而有餘，一時皆大歡喜，中青年人紛紛購置，貧窮人情願衣不蔽體，食不裹腹，也須購買一頂，以為藏辮之需」^㉒。

這種大規模的剪辮，有時居然會惹到洋人頭上。當一些為西方人做事的買辦和僕役難逃劫運丟掉自己的辮子的時候，他們的主人往往會出面交涉，英國駐長沙領事就曾經為太古洋行的一位買辦的遭遇提出過「強烈的抗議」^㉓。諳熟西方政治的外國人，從共和政體的規範出發，質疑革命黨人的這種有礙自由和人權之舉，往往令革命黨人有些難堪，但也只做到了涉及到洋人時才有所收斂^㉔。

有時，強行剪辮也會釀成風波。1911年11月，蘇州新軍的某排長等率領士兵在城裏強剪路人辮子，結果「被眾不服，圍住痛毆」，將該排長打傷^㉕。而安徽事情鬧得更大，獨立後，擁護前清巡撫朱家寶的舊勢力，恰是煽動一些對剪辮不滿的安慶市民，圍攻革命黨的都督王天培，以反對剪辮為名，將其迫走，「遇有西裝無辮之人，遂任意毆毀。旋經紳商學界仍公舉朱家寶為臨時都督，並沿街勸導，其事始寢」^㉖。

當然，革命黨人如此急切地要人們去掉腦後的辮子也是有他們的道理的。首先，他們將辮子看成滿清留在漢族人身上恥辱的標記，所以必須去之而後快。我們知道，即使是同盟會中人，大多也將「驅逐韃虜」看得遠重於「建立民國」，經過同盟會長期的宣傳，像與辮子有關的「嘉定三屠」之類的滿清血案，已

革命政府最忙的三件事是剪辮、放足和打菩薩，他們最熱心、執行最力的就是剪去男人的辮子。尤其是那些靠革命黨人拼殺而獨立的地方，設有武裝的剪辮隊上街強行為人剪辮。當然，強行剪辮的「武行」出台之前往往有屬於「文行」的宣傳，但往往文的還沒有演完武的就開鑼，所以老百姓一聽到有人宣傳剪辮就望風而逃。

晚清時節，西方人一直將中國人視為不開化的「土人」和「野蠻人」，而其標誌就是纏足和辮子。因此革命黨人要盡快地消除這種奇恥大辱的印象。但風氣未開的農民和市民害怕辮子被剪後會被用來行巫，從而危害被剪人的生命，這也正是為甚麼被強行剪了辮子的農民苦苦哀求討還被剪掉的辮子的原因。

經深深地印在所有投身革命的新軍和學生腦海中，一旦革命成功，他們很自然地要盡快洗刷這種長達260年的恥辱。其次，革命黨人也將辮子視為奴隸的標誌，他們要給人們自由。以先知先覺者自居的黨人，既然革命，當然要親手解放老百姓，而不願意剪辮則被視為「奴隸根性」頑固不化，所以非得以外力打破不可。其實最刺激革命黨人，使他們不僅要去掉自己的辮子，而且還要去掉別人的辮子的動機，原為西方人的嘲笑。晚清時節，西方人一直將中國人視為不開化的「土人」和「野蠻人」，而其標誌就是纏足和辮子。他們譏中國男人腦後的辮子為pig tail，而且上海租界的外國巡捕抓中國人以及八國聯軍搜捕義和團，往往揪住辮子，一抓一串。我們在許多革命者的記敘中，都能發現這種譏諷和場景的刺激而留下的強烈印象。實際上，正是要盡快地消除這種奇恥大辱的印象，他們才會不惜放下手中要務，先來對付辮子。我們看到，潮州的剪辮文告中就有這樣的文字：「蓄髮垂辮，滿清陋制，豚尾懸肩，供人戲弄；民族光復，理應毀棄，若不自動，軍民代剃。」^⑥顯然，從這個角度講，剪辮實際上是在向西俗看齊，並非恢復清以前的傳統，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做「假洋鬼子」，所以，老百姓接受的難度就更大一點。

在華的英國外交官看到中國老百姓為了躲避剪辮而戴上頭巾和帽子，而革命政府的警察居然還要檢查時，不無揶揄地寫到：「警察對自由的熱忱，常常促使他們去攫取那些沒有惡意的過路人的帽子，以便查明在這個自由的領域內，這些過路人是否在內心仍然是滿清的奴隸。」^⑦也許革命黨並沒有想到，他們的作法實際多少墮入了傳統征服者強迫歸順的老套，而這正是他們所憎恨的滿清統治者當年做過的事情。人們內心是否歸順，實際上是不容易測出的，而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留着辮子，並不就意味着心向滿清。我們知道，剪掉辮子在清朝意味着反叛（晚清雖然有鬆動，但在老百姓眼裏，依然是了不得的事情，具有生命的危險），而在革命黨則意味着投向革命，雙方未卜勝負的時候，強迫信息閉塞的老百姓做出在他們看來有性命之憂的抉擇，委實是強人所難。我在前面說過，其實老百姓對清朝並無留戀，於革命黨的革命也基本上持歡迎態度，但同情革命是一回事，投身革命又是一回事，在老百姓心目中，剪掉辮子就意味着投身反叛，自己就成了叛黨，而這恰是株連九族的事情。所以讓農民將辮子如阿Q式地盤起容易，但讓他們將辮子剪掉卻難，剪掉了辮子，一時半會兒長不起來，如果皇帝再坐龍廷怎麼辦呢？雖然辛亥年底，迫於革命的壓力，清廷頒布了允許自由剪辮的詔令，但是大多數老百姓並不知道。

更往深裏說，對於那些風氣未開的農民和市民而言，辮子還有另一重意義。讀過孔飛力(Philip A. Kuhn)《叫魂》(Soulstealers)的讀者想必會知道，人們對乾隆年間剪辮風波的恐慌，主要是巫術性質的。人們害怕辮子被剪，主要是擔心剪下來的辮子會被用來行巫，從而危害被剪人的生命，這也正是為甚麼辛亥期間被強行剪辮的農民苦苦哀求討還被剪掉的辮子的原因。基於這個道理，即使老百姓大部分要回了自己被剪的辮子，但畢竟被剪掉的辮子很可能會丟失，所以，恐慌很快就瀰漫起來。顯然，這種恐慌對革命政權並不利。如果說，催糧納賦不過是襲承前朝，農民雖然失望，但還說得過去，而剪辮政策，

在老百姓眼裏，不啻是一種添加出來的暴政。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成為革命政府失掉民心的開始。

五 結 語

從表面上看，下層民眾對於革命的態度，與這場革命能否成功並無多大的關係，起義和戰爭，起決定作用的往往是直接的軍事力量對比，以及雙方戰略戰術的選擇和武器與其他和軍事有關的條件。但是，即使是最唯武器論的軍事家，恐怕也難以否認士氣這一類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恰恰是這種類似精神性的因素幫了革命的忙。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未必強於清軍，其指揮也不見得高明，清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自身的統治信心已經瓦解，這種瓦解近乎某種普遍的崩潰，幾顆炸彈就能讓滿朝文武作鳥獸散，有的地方，革命黨人還沒有露面，僅僅十幾個根本沒有來頭的烏合之眾，就能讓擁有兵馬的清朝地方官交印投降。這種統治信心的瓦解，無疑與「民心已失」的普遍認同有着關聯。當社會上充斥了敵意，反叛行為得到普遍的同情，社會秩序陷入紊亂的時候，不僅紳士階層對王朝的信心會受到影響，連帶着各級官吏也會心存另謀出路的異心，老百姓的態度實際上是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地刺激着官吏和鄉紳，日積月累地銷蝕和瓦解着上流社會對王朝的信心和忠誠。幾個、幾百個甚至幾萬個老百姓對政府不滿、希望政府垮台當然並沒有多少效用，但是如果這種情緒成為一種普遍而持久的心態，就可能從根本上瓦解統治，這個時候，只要遇到外力或者內亂的刺激，而且這種刺激又具有一定強度的話，就可能導致全面崩潰。

孫中山曾經說過，庚子以前，「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而庚子以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⑩。雖然孫中山將這種「差若天淵」的變化半歸之於其黨人鄭士良惠州起義的「喚醒」，未免有革命黨人的自負，但他對民心變化的感覺卻是相當準確的。

只是，民心的變化並不是因為革命黨人那一次次小打小鬧的起義，跟他們聲勢不小的宣傳也沒有太多的關係。庚子義和團運動無疑是與下層民眾關聯最為密切的歷史事件，清廷的表現有目共睹，令下層百姓寒心也是理所當然。接下來奉旨（洋人之旨）變法的新政，又火上澆油，使這個王朝喪失了在老百姓眼裏的最後一點合法性依據，辛亥革命的成功，有着十分複雜的原因，但與民眾的普遍反感和期望「變天」不無關係。

然而，成功了革命黨人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在革命後袁世凱的北洋系、各省鄉紳和前立憲派混合的地方實力派以及革命黨人的力量對比中，革命黨人雖然看起來人多勢眾，其實在革命時期擴張起來的勢力中，農民和流民遠沒有與革命黨人達成起碼的親和，很多地方的民軍，其實像是各行其是的烏合之眾。地方實力派出於對清廷收回散在地方的權力的不滿，順從了革命，但是他們對革命黨人的敵意卻並未消失，情願擁護似乎更講究規矩的袁世凱。革命黨雖然與地方實力派在革命過程中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但並不在意維護，

表面上看，下層民眾對於革命的態度，與革命能否成功並無多大關係，起決定作用的往往是軍事力量的對比。但是，即使是最唯武器論的軍事家，也難以否認士氣這一類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恰恰是這種類似精神性的因素幫了革命的忙。清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心已失」，導致對其統治信心的瓦解。

同時卻在與地方實力派「咸與維新」的種種努力中，摒棄了下層民眾，甚至為了維護鄉紳的利益，不惜鎮壓農民。大力推行的強迫剪辮的舉措，更是無端製造下層社會的恐慌，失掉了本來可以獲得的民心，某種程度上將民眾推到了地方實力派那裏，革命後真正革命的革命黨人屢屢在地方政府失掉權力，老百姓寧願擁護前立憲派的官僚和紳士上台，江蘇甚至傳出了歌頌某些前清開明官僚的民歌（蘇州有兒歌云：「蘇城光復蘇人福，全靠程都督。」^⑨），這實際上已經說明問題了。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南京英國外交官發現，強迫徵稅和強迫剪辮已經在南京城內引起普遍的厭惡情緒，「廣大群眾開始認識到，豁免一切捐稅以及關於新太平盛世將帶來繁榮昌盛的其他一些普遍幻想的前景，事實上是沒有根據的。在許多場合下，他們開始對他們所給予革命運動的同情和支持感到後悔」^⑩。當然，這種後悔還不至於導致針對革命政權的騷亂和反抗，但足以銷蝕這個政權的基礎，遇有外力壓迫，就難以支持。

革命後，由於革命自身的聲勢，革命黨人依然在政壇上十分活躍，但實際上已經成了空架子，地方基層政權不是偷天換日，就是改頭換面。中國不是西方國家，第一次國會大選的勝利其實並不能說明革命黨的實力（農民根本就沒有投票），擁護它的多是浮在面上的「洋」學生，而這些人遠沒有他們作為紳商的父兄的根底。革命政權雖然時日不多，但已經在老百姓中留下了毛糙浮躁的印象（農民對此特別反感），他們對這樣不穩的統治自然不無擔心。雖然革命後革命黨人擁有的軍隊數量大為減少，但在革命黨、袁世凱和地方實力派的三方實力對比中，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依然有相當規模，然而在還談不上精銳的袁軍打擊下，居然雪崩似的瓦解，確實是件令人費解的事情。革命黨的組織渙散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眾對他們喪失信任和失去親和力確也是個不小因素，不是說老百姓的傾向直接促使了革命黨人的慘敗，而是地方實力派在民心求穩的情況下得分增多，無形中強化了反對勢力。甚至民心的歸附與否，也影響到了革命黨人軍隊的士氣和人心，從而大大削弱了民軍的戰鬥力。外力的壓迫激活了民眾的反感，而這種反感則放大了外力的效應。

如果說，在一般的歷史條件下，下層民眾的意向是通過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釋放能量的話，那麼，當袁世凱揮起屠刀砍向革命黨的時候，在突然到來的軍事壓力面前，民眾的反感和冷漠終於轉化成了某種情景，促進了革命黨雪崩式的瓦解。在革命黨和袁世凱的較量中，地方實力派毫不猶豫地成了幫兇，而老百姓則變成了麻木的旁觀者，甚至寧願跟在實力派的後面看熱鬧，對革命黨人的遭遇，他們甚至連一點起碼的同情和留戀都沒有，在某些黨人看來，民眾對他們似乎比對滿清還要冷酷無情。二次革命後，革命黨人頹廢的多、出家的多、自殺的多，或多或少跟吾國吾民這種「麻木」有些關係。

「得民心者得天下」倒不見得是個始終能被歷史所印證的命題，但失民心者卻是有可能失去已得的天下，尤其是在剛得天下，而又有外力的壓迫的時候。在北洋和地方勢力的雙重壓迫下，革命黨人要想保全革命果實固然很不容易，但像後來那樣被迅速地掃出門卻也出人意料。我們當然不能期望當年的同盟會中人，像後來的共產黨人那樣進行民眾動員，但在當時的情景下，要求他們做到將老百姓的感受當回事也似非屬求全責備。

雖然革命後革命黨人擁有的軍隊數量大為減少，但在革命黨、袁世凱和地方實力派的三方實力對比中，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依然有相當規模，然而在袁軍打擊下，居然雪崩似的瓦解，確實是件令人費解的事情。革命黨的組織渙散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眾對他們喪失信任和失去親和力確也是個不小因素。

註釋

- ①⑧⑩⑬⑭⑰⑲⑳㉑ 揚州師範學院歷史系編：《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61），頁182；217-18；295；301；301；201；202-204；223-26。
- ② 《成安縣志》（民二十年刊本），丁世良編：《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華北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頁451。
- ③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集體編寫：《中國民間文學史》，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273。
- ④ 同上，頁276；亦見景梅九：〈罪案〉，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近代史資料專刊：辛亥革命資料類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 ⑤ 董繼廣等：〈柘城農民起義紀略〉，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五）（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頁386。
- ⑥ 景梅九：〈罪案（節錄）〉，頁75。
- ⑦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46、259。
- ⑧ 胡恭先：〈西昌辛亥見聞〉，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三），頁236。
- ⑩ 李明吾等：〈上黨幹草會運動〉，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五），頁194-95。
- ⑪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80），頁253。
- ⑫ 郭孝成：〈陝西光復記〉，載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六），頁38。
- ⑬ 蕭華清：〈一個縣城學生看到的辛亥革命〉，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七），頁383。
- ⑭⑯⑰⑱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450；390；444。
- ⑲ 陳日剛：〈大足同志軍〉，《辛亥革命回憶錄》（三），頁267。
- ⑳ 參見〈日本駐漢口領事館情報〉第58號，載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譯組編：《近代史資料（第1號）：辛亥革命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600。
- ㉑ 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上）（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26。
- ㉒ 中國近代經濟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海關與辛亥革命》（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87。
- ㉓ 《時報》，1912年11月7日。
- ㉔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頁231。
- ㉕ 愛德華·弗里曼（Edward Friedman）著，陶宏開譯：〈革命運動還是流血事件？〉，載《辛亥革命史叢刊》，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91。
- ㉖ 汪曾陽：〈辛亥紀事詩〉，載《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頁216。
- ㉗ 林端輔：〈寧波光復親歷記〉，載《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180。
- ㉘ 參見江天蔚：〈辛亥革命後松陽的一次剪辮鬥爭〉，載《辛亥革命回憶錄》（四），頁203-204。
- ㉙ 陳逸齋：〈故鄉興化見聞〉，載《辛亥革命回憶錄》（八），頁112。
- ㉚ 英國駐騰越領事的僕人被抓住，但是在說明他的身份後，沒有丟辮子就得到了釋放。參見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頁320。
- ㉛ 郭孝成：〈江蘇光復紀事〉，載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七），頁9。
- ㉜ 郭孝成：〈安徽光復記〉，載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七），頁175。
- ㉝ 翁輝東：〈潮汕光復回憶〉，載《辛亥革命回憶錄》（七），頁259。
- ㉞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頁320-21。
- ㉟ 孫中山：〈建國方略〉，載《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35。
- ㊱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頁128，此史料係由反程德全的人提供的，因此相當可靠。